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4.003

美国毛泽东研究“心理历史学派”的批判性透视

贺银垠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美国毛泽东研究“心理历史学派”有革命不朽、文化心理和心理传记三种主要分析模型。“心理历史学派”从表面上看追求心理和历史的互动,是唯物史观分析框架的有益补充;实际上,其援引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心理史学从根本上违背了一元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这要求我们自觉规避对“心理历史学派”的外在批判,深入其内在理路有的放矢,同时正视“心理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启发,使之成为深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有益资源。

关键词:毛泽东;“心理历史学派”;心理历史分析法;外在批判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4-0016-06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首次将系统的心理学理论引入毛泽东研究,从情感意志出发理解毛泽东及其思想,推动毛泽东心理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剖析美国学者心理历史分析的核心命题,澄清毛泽东心理分析的误区,一方面可以批判和回应从心理分析视角歪曲毛泽东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另一方面有助于吸收、深化和拓展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资源。

一 “心理历史学派”的三种分析模型

在心理历史分析的思路下,“心理历史学派”学者从各自的知识背景出发,援引不同的心理分析理论,以探析毛泽东的心理及对其思想理论的影响。

第一,利夫顿^①以“革命不朽”为核心的抽象理论分析。罗伯特·利夫顿是最早专门运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在奥地利心理学家奥托·兰克关于人类的出生焦虑及追求存在不朽的理论基础上,他创造出了“象征不朽”研究战

争、革命和突发事件造成的“个人和历史框架中的生命创伤”^②。所谓“象征不朽”是指人出生以后产生的对死亡即将到来的焦虑以及对生命永恒存续的期盼^③。具体到革命者身上,象征不朽表现为“革命不朽”,指革命者追求革命事业长存的期望以及因担心革命可能失败导致的深刻焦虑。关于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进程,利夫顿明确批驳了所谓党内权力斗争的阴谋论,认为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事件”起源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不朽的忧患意识。他指出:“中国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可以被理解为对革命不朽的追求。我所指的革命不朽是一种对革命永恒发酵的共同参与感,是在持续不断的革命中永远地‘活着’从而超越个体死亡。”^④在此基础上,利夫顿又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赶超意识进行了解读。显而易见,这些是利夫顿基于死亡焦虑单一线索形成的主观认识。由于利夫顿的研究缺少大量的经验材料作为支撑,因此他的研究理

收稿日期:2020-02-13

作者简介:贺银垠(1994—),女,湖南双峰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等方面的研究。

^①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著有《思想改造和总体主义心理学:中国教育运动研究》《生死之中:广岛幸存者》《纳粹医生: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等,其毛泽东研究专著《革命不朽:毛泽东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于1968年出版。

^②August G. Lageman.“Encounter With Death: The Thought of Robert Jay Lifton”,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1987(3): 300-308.

^③参见 Robert J. Lifton. *Death in Life: Survivors of Hiroshima*, Basic Books, 1982.

^④Robert J.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7.

论化程度最高、也最为抽象,实际上也远远脱离中国社会现实,被认为是“从人类对永恒生存的持续需求出发进行的探索性推测”^①。此外,利夫顿将不朽感视为“一种存在主义的绝对物”,使得他的研究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但利夫顿是一位精神病学家,他的研究主要是在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确立的框架下进行,因此,其开展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资源实质上是“弗洛伊德理论同存在主义的某些分析要素的混合物”^②。

第二,理查德·所罗门^③从行为科学着手的文化心理考察。出版于1971年的《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一书,是所罗门从文化心理角度研究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作品,带有白鲁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明显印记。所罗门从中国早期儒家经典中探索传统中国人的育儿模式和初级社会化过程,并对91名中国人开展深度访谈,构建传统中国成人对待权威的基本态度。他认为早期儒家经典强调服从父式权威、压抑情感表达,深刻塑造了传统中国人的政治态度,并持续影响着现代中国。他指出,毛泽东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心理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因此要对这一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施加改造以适应政治和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新挑战。“毛泽东的领导体现了努力改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为维持政治影响而吸收传统因素的矛盾。”“因此毛泽东为取得国家伟大成就而组织的新的政治和社会观念,与中国人民身上持存的传统社会态度和政治习性之间存在重要的紧张关系。”^④所罗门运用了现代行为科学和调查统计的方法,将他的结论建立在大量数据基础上。因此,有学者认为所罗门的研究“为理解中国政治提供了最完整扎实的证据,同时在处理中国政治问题的方法论上开辟了新局面”^⑤。也有学者持完全相反的意见,认为所罗门的研究是基于先入之见对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政

治文化心理的误读^⑥。无论如何,所罗门从政治文化心理研究毛泽东的革命取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政治文化心理不可能是整钢一块,更不会一成不变,所罗门将两千多年中国政治文化心理同质化的处理方式是不正确的。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当代出场,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

第三,白鲁恂^⑦从人生史角度为毛泽东作心理传记。1976年,白鲁恂出版《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一书,首次从个体生命史的角度,以心理传记的方式比较完整地描绘毛泽东的个性心理。他延续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文化心理思路,同时吸收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心理模型,以“自恋感和边缘性人格综合征”为核心分析毛泽东的私人形象,进而分析其对毛泽东领导风格和技能的影响。白鲁恂分析毛泽东个性心理的目的不仅在于“走进”毛泽东的心理世界,而且想要从个性心理因素中寻找毛泽东之所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奥秘。他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伟大,秘密在于一些别的地方——在于他能够理解、唤起和引导人类情感的非凡能力;以及以他自己的人格,去驾驭他人的情感与激情的无数种方式”^⑧。就是说,毛泽东的情感动力机制决定了它具有非凡的情感感知能力,能够敏锐地捕捉和理解近代中华民族要求洗刷外辱、实现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反抗压迫、解放自身、当家做主的民主诉求,并将这些情感冲动和力量转化和升华为革命的强大动力。白鲁恂反对美国学者不加反思地接受意识形态化的毛泽东及其思想,主张把毛泽东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个人来看待。因此,他的研究结合了大量毛泽东生平相关的材料,和心理学的理论假设,是“心理历史学派”理

①Richard M. Pfeffer. "Review", *The China Quarterly*, 1969(38): 166-170.

②萧延中:《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页。

③理查德·所罗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外交官,密歇根大学政治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期间导师为白鲁恂,著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中国毛主义革命的形象盛宴》《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国政治谈判行为》等。

④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xiii, p.1.

⑤Kent Morrison. "Surmounting the Barriers of Retardation: A Slight Leap Forward",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972(1): 128-136.

⑥Mote F W. "China's Past in the Study of China Today: Some Comments on the Recent Work of Richard Solom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72(1): 107-120.

⑦白鲁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中国问题研究学者,著有《中国政治的精神》等十多本中国研究专著。

⑧白鲁恂:《毛泽东的心理分析》,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5页。

论设计的一次完整呈现。

二 唯物史观视阈中的心理历史分析

科学评判美国“心理历史学派”和心理历史分析方法和得失,必须以坚持唯物史观为根本原则。依据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毛泽东研究不排斥心理层面的分析,并对了解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心理有一定需求。但“心理历史学派”学者们并未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援引错误的心理分析理论导致背离其研究初衷,走入歧路。

美国“心理历史学派”从个性心理出发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初衷,和毛泽东研究应秉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是不冲突的。历史的主体是现实的、革命的、能动的人。恩格斯曾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想的目的。”^①这些在历史场域中活动的个人,总是在一定历史阶段、过去遗留下来的、给定的条件下进行生产和创造;他们具有主体能动性,能够在历史允许的范围内将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对象化,甚至在历史关头转变发展方向。人的主体性决定了历史解释和研究绝不能忽视主体要素,这些要素不仅包括高度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和制度,而且涵盖个人和集体的意志、情感及相对稳定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

受历史条件和时代任务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将重点放在了“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②上面。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为了指导和服务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人类解放事业,历史唯物主义必须从客观的社会结构矛盾运动出发来论证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无产阶级开展革命运动指明方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工具是科学的抽象力,历史唯物主义是高度抽象的理论产物。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均等地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详

细解释,提供的不是可供直接利用的现成答案,而是理解和研究人类历史的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必须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框架更注重从经济政治关系、社会矛盾结构运动以及阶级对立等宏观视角来看待人类实践活动,而在微观和中观等历史现象学层面发力相对较少、解释力度比较薄弱。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常被误解和歪曲为经济决定论的原因,也是心理分析长期被唯物史观分析方法排斥的依据。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向度不意味着漠视人及其动机和意志的作用。相反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都有涉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客观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恩格斯晚年也不断强调,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并非意味着政治、文化和思想等因素是消极惰性的。社会各要素“是在归根结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③。普列汉诺夫对历史过程中的心理问题有过专门论述。他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历史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心理问题。”“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④社会心理被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中介,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肯定。心理因素,尤其社会心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越来越凸显。

加之,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经济决定”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成立的,这条根本原则不仅不能代替和取消具体历史研究,反而需要丰富的历史解释来支撑其科学性。事实也证明,教条式地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对结构性矛盾不分场合地运用,实际上是一种偷懒行为,最终导致理论研究的僵化。“宏大叙事如果没有大量具体的现实研究作为支援,往往沦为干巴巴的理论推演与熟知的框架描述而缺少实质性内容。”^⑤具体到毛泽东研究,这就要求研究者全面理解马克思主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9页。

④《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85-186、272页。

⑤李海青:《困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种反思性的视角》,《哲学动态》2012年第3期。

义历史观的原理,重视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性格心理及其影响,在具体分析中利用新理论新方法来完成和锐化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在毛泽东研究中的感知末梢。

但从实践结果来看,“心理历史学派”尽管富有创见地提出了问题,却没有妥善地解决问题。在历史场域中活动的任一主体,必定是带有一定动机、目的和意图的个人和群体。理解毛泽东必须将他置于实现个人价值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过程之中,这个过程必然涉及毛泽东的理想信念、人生追求和情感意志等不易直接经验和量化的因素。“心理历史学派”学者们抓住了这个问题,但他们的分析方法、论证过程以及许多具体结论存在严重缺陷,距离“走近”毛泽东的心理世界还有很大距离。比如,从分析方法上看,心理历史分析产生于 20 世纪上半叶,本身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尚未形成稳定的规范,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从论证过程来看,心理历史分析倾向于用普遍的心理学概念来套用毛泽东的行为特征,通过材料裁剪和拼凑呈现出一个“统一的”毛泽东形象。这种分析方法和论证手法的弊端大大挫伤了毛泽东研究领域正视心理历史分析的积极性。

归根结底,美国“心理历史学派”的根本错误在于其援引的心理分析理论违背了唯物史观。美国毛泽东研究“心理历史学派”学者们在心理史学的引导下,始终要求实现心理与历史的辩证统一,但事实上他们的心理学理论预先瓦解了这一可能。“心理历史学派”的主要理论渊源是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理论及相关变种。20 世纪初,弗洛伊德在实现心理学革命后,将理论重心转向了对原始社会和人类文明史研究。他认为,在人格结构中,自我在本我和超我的对立中遵循着现实原则,而在人类历史上不是生产力发展而是本能的压抑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和进步^①。为了进一步发展为一门有说服力的社会科学,精神分析理论试图与唯物史观结成亲缘关系,与精神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同流,以综合、补充和改造马克思主义。赖希、奥兹本、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弗洛伊德主义者均认为,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别侧重从人的本能需要和人的经济需要主客两方面出发来理解人类历史、批判资本主义,因而这两种理论都是唯物主义的;二者的结合可以各取所长,综合为对历史的物质和精神维度的全面理解。“辩证唯物论对于精神分析学的发现提供了唯一可能的理论;同时精神分析学的这些发现,因为是独立完成的,对于辩证唯物论之正确性更能提供空前的最显著的证明。”^②奥兹本甚至将弗洛伊德称为“彻底的不妥协的唯物主义者”^③。这一思潮扩展到历史学研究,发展为心理史学^④。作为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历史学分支,它主张运用心理学理论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强调历史人物所在的社会环境和经历对其心理的影响。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心理与历史的统一成为心理历史分析的重要指针,这一点在“心理历史学派”的毛泽东研究中也反复强调。于是,心理历史分析自我标榜为唯物主义,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

但精神分析理论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截然不同。与唯物史观把握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相比,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物”指向的是经验性质的精神生活。确切地说,历史唯物主义和心理分析理论在历史本体论层面是完全相对的两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全部历史的出发点,人类所创造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都可以从中得到根本性的理解。“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⑤而心理历史分析的理论则恰恰相反,它以心理与历史的二元论为理

①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9 页。

②奥兹本:《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引言第 4 页。

③奥兹本:《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1 页。

④1910 年,弗洛伊德发表长篇评传《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回忆》,最早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历史人物。此后涌现出了许多心理史学的作品。但通常认为,1957 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威廉·兰格发表就职演说《下一个任务》和 1958 年艾瑞克·埃里克森出版《青年路德——精神分析与历史研究》,两个历史事件共同标志着美国心理史学的正式诞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2 页。

论基础,拒绝承认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历史进程的唯一根本性地位,反而将人的性格结构及其所在的环境当作历史发展的双元动力。威廉·赖希曾说,“本能的过程和社会经济的过程决定着人类存在”^①。这一论断赫然揭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心理历史分析在历史理解路向上存在的本质差别。

三 对“心理历史学派”的批判美国“心理历史学派”的心理分析理论从根本上是非唯物主义的,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毫无价值。出于借鉴方法论资源、深化毛泽东研究的目的,我们应自觉规避对“心理历史学派”的外在批判,以更深邃的眼光辩证看待心理历史分析方法。

一方面应该自觉规避对“心理历史学派”的外在批判,从思想史的脉络中对其加以准确衡量和定位。所谓外在批判是指不进入“心理历史学派”的内在理路,而站在己方立场和知识背景的前提下对其采取“贴标签”的批判和全盘否定。批判美国毛泽东研究“心理历史学派”必须明确的是,对结论的批判、对研究方法的批判、对方法的理论前提的批判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复杂系统,如果找不到美国学者开展毛泽东的心理分析的“根子”,这种批判必定流于表面,既无法准确地评价“心理历史学派”,更遑论吸收有效的研究方法为我所用。

以苏联学者批评白鲁恂的毛泽东研究为例。苏联学者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提出“在任何对历史和社会心理相互影响进行的研究中唯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提供恰当的科学基础”的正确论断,为反思和批判白鲁恂的研究指明了根本的方向和思路。遗憾的是,他们的批评集中于历史观上的对白鲁恂的外在超越,实际则很少深入挖掘和“斩断”心理传记分析的“祸根”。他们没有准确了解白鲁恂的研究,低估了批评白鲁恂的难度。在他们看来,白鲁恂只是将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心理理论运用于分析与毛泽东相关的“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对1949年前的社会心理氛

围只进行了简要的概述”^②,根本没有对中国社会、文化心理以及毛泽东个人形成全面的认识。这些判断没有准确认识白鲁恂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中的地位。白鲁恂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有过长期在中国生活、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常年耕耘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在进入毛泽东的心理分析之际,他已经完成数部中国问题研究专著,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近代中国社会的社会心理状况和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挑战等关键问题都形成了自己比较明确的判断。此外,白鲁恂的心理传记分析还吸收了以拉斯韦尔、阿尔蒙德为代表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以及20世纪中叶正在发生变革的社会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等。由此可知,要驳倒白鲁恂的结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对其背后的理论资源库有一定了解和鉴别能力。白鲁恂的理论和判断当然带有他个人偏好和意识形态偏见,但通过矮化白鲁恂来达成所谓的批判是不可取的,任何批判只有深入到白鲁恂的研究之中才可能有的放矢、落到实处。

另一方面要辩证看待“心理历史学派”的毛泽东研究,正视心理历史分析的方法论价值。从整个社会科学,尤其历史研究的新进展来看,心理历史分析的价值越来越凸显。有学者指出,“重视研究人的行为与心理,以及应用现代心理学来从事这种研究,不仅与马克思主义不相矛盾,而且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题中应有之义,将会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③。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阈中美国毛泽东研究“心理历史学派”的理论根基和具体结论违背了唯物史观,但是其提出的研究思路对于拓展和深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发。主要体现在以下可能性之中:一是把毛泽东的心理层面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决定了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个全新领域的出现”^④。这标志着毛泽东研究在思想理论和生平研究等基础阵地上开拓了一片新领地,向更全面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迈进一步;二是心理分析是对宏观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的有益补充,能够从

①威廉·赖希:《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序言第12页。

②萧延中:《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8-294页。

③罗凤礼:《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④尚庆飞:《略论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心理历史学派”》,《学术界》2008年第3期。

非理性的、微观的角度完善毛泽东肖像的细节;三是分析毛泽东的性格心理对其思想产生的影响,意味着心理历史分析成为推进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问题式和有力抓手。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美国毛泽东研究“心理历史学派”的错误和价值有了更加全面的把握,尝试着将心理历史分析发展为毛泽东研究的新范式。这彰显出学者面对国外研究成果“为我所用”的方法论自觉和主体意识。但处理心理与历史的关系、从心理出发解释历史并非易事。在实际历史进程中,一定生产关系之中的物质生产、政治活动、思想、观念、心理、信仰和动机等理性和非理性意识都从属于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历史科学的研究活动要求我们将这些因素从历史总体过程中抽象出来,把它们看作独立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并对这些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作出说明。正如史华慈所言:“思想世界同心理机制世界的关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哲学问题……虽然心理因素对我们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但问题是,心理因素

究竟如何对我们的思想产生影响?这样的影响又达到哪种程度呢?这些问题悬而未决。”^①如何在综合考量这些影响因子的基础上看待历史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恰当的解释,这仍然是贯穿在历史研究领域的难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对“心理历史学派”的研究和心理历史分析法的创造性转换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我国学界对“心理历史学派”的研究虽然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但总的来说侧重于介绍和总的批评。就借鉴研究方法的长远目标来说,缺乏对“心理历史学派”的全面系统的了解,缺乏对心理历史分析方法的深入分析,缺乏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历史学和毛泽东研究等多重谱系内的准确定位。这些都要深耕美国毛泽东研究“心理历史学派”的方法和理论,推动从对“心理历史学派”的质性判断到量化分析的转变,进一步实现从批判性阅读“心理历史学派”到自觉建构科学的心理分析范式的转变。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Psychohistory School” in America’s Mao Zedong Study

HE Yin-yi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psychohistory school” of America’s Mao Zedong study has three major analysis models, that is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psychological biography. Superficially, the “psychohistory school” pursu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sychology and history, and sees psychoanalysis as a useful supplement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ic analysis framework. In fact,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and psychohistory cited by it are fundamentally contrary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requires us to consciously evade the external criticism of the “psychohistory school”, delve into its inner rationale, and face up to the methodological inspiration of the “psychohistory school”, making it a useful resource for deepening the researches of Mao Zedong and his thoughts.

Key words: Mao Zedong; “psychohistory school”; psychohistory analysis method; external criticism

(责任校对 朱春花)

^①迪克·威尔逊:《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2页。